

我国开发区的空间生产特征、影响因素与演进模式：40年回溯与解析*

Spatial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volutionary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Zones in China: A 40-Year Retrospective Analysis

王启轩

WANG Qixuan

关键词 开发区；空间生产；影响因素；演进模式；特征解析

Keywords: development zone; spatial production; influencing factor; evolutionary pattern;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提 要 我国的开发区建设已历经40年。开发区不仅是我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促进全球资本循环、区域协调发展和体制机制创新的政策空间。开发区的发展与转型过程呈现出多重空间生产特征，但既有研究主要借鉴西方理论模型，对我国开发区空间生产的独特机制尚待深入解析。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及资本三级循环模型的溯源，分析我国开发区的空间生产特征、关键影响因素并归纳其演进模式。发现在不同发展阶段，开发区的空间生产体现出政府引导下的权力嵌入、资本循环与空间重构特征，并主要受到空间实践主体、资本循环动机及区域互动模式等3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总结开发区空间生产的“分阶段、分环节”演进模式，以合理解释我国开发区转型中生产环节优先、消费环节滞后的现象，并明确政府在各阶段制度设计与空间实践中的角色，包括参与者、管理者和服务商等。研究为理解政府主导下的开发区空间生产提供了理论支撑，并希冀为新时代的开发区转型发展和城市空间治理提供启示。

Abstract: In the past 40 years, China's development zones have not only served as key drivers of the country's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but also functioned as crucial spaces for facilitating global capital circulation,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advanc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zones exhibit multiple spatial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primarily draw upon western theoretical models, leaving the unique mechanisms of spatial production in China's development zones under-explored. By tracing the origins of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and the three circuits of capital,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spatial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volutionary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zon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across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development zones is shaped by government guidance, capital circul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Three primary factors influence these characteristics: actors in spatial practices, capital circulation motives,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zones and cities. Building on these insights, the study identifies a "stage-based, process-oriented" evolutionary pattern of spatial production in development zone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prioritizing production over consumption. Furthermore, it elucidates the government's evolving roles in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spatial practice at various stages. This study enhan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state-led spatial production in development zones and offers theoretical insights into spatial governance in urban transformation.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6361/j.upf.202502007

文章编号 1000-3363(2025)02-0051-08

作者简介

王启轩，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后，wqx3@tongji.edu.cn

*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超大城市产业空间的转型特征与治理路径研究——以上海市为例”（项目编号：2024ECK003）

自1984年第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以来,我国开发区已历经40年发展,成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承载地^[1-2],并为我国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①。纵观我国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为代表的开发区实践历程,其在中央政府设计的总体制度框架下,兼具权力嵌入、资本循环、空间转型等多重空间生产特征,成为考察我国城市空间生产过程的重要对象^[3-4]。

开发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承担促进城镇化建设、产业经济增长和探索体制改革的使命,其发展过程包含多个特色鲜明的阶段已成为学界共识^[1,5-6];开发区不断转型升级的现象,被学界形象地归纳为“二次创业”和“三次创业”等^[7-8]。基于空间生产视角,诸多学者已运用“空间三元辩证法”^[9]以及“资本三级循环”^[10]等模型来分析开发区等战略空间的多阶段发展与转型议题^[3,11]。然而,不同于西方国家以市场主体为关键驱动力的开发模式,我国开发区是制度创新和空间实践的集合体^[12],其快速发展的核心因素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既得益于深化改革背景下诸多制度和政策试验亟须空间平台承载,又受到对外开放后全球资本流动等外部动力影响。因此,对我国开发区空间生产的研究,在借鉴西方理论模型的同时须结合现实国情,合理解析其影响因素和归纳演进模式。本文首先溯源经典理论模型,初步探讨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开发区转型议题;其次,结合开发区发展阶段,解析“三次创业”转型中的空间生产特征;再次,从空间生产研究较为关注的权力、资本、空间等三个维度,分析开发区空间生产的关键影响因素;最后,阐释我国开发区通过空间生产实现资本循环的多阶段演进模式,聚焦政府在开发区实践及转型中所起的作用。研究意图总结开发区这一中国特色空间生产工具40年来的建设经验,归纳其空间生产特征与资本循环模式,亦希冀为新时代的开发区转型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布局优化提供一定启示。

1 理论溯源和研究框架

1.1 空间生产与资本三级循环

二战后,欧美城市先后经历重建和转型,成为资本积累和社会矛盾发生的核心场所。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基于对资本主义静态空间观的批判,将对实物生产的思考引申至社会空间领域,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the the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空间生产理论聚焦空间、社会和社会生活生产之间的关系,认为空间是由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的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②等三个相互关联的过程所塑造的社会结构^[9]。目前,这一理论已被运用于我国城镇化研究中^[13-14],并探索了国家级新区等战略空间内资本、权力等与空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过程^[11,15]。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等新马克思主义(下简称“新马”)学者发展并应用空间生产理论,包括将其与资本剩余价值等理论结合,开展社会、空间、经济、政治的综合分析^[16]。其中,大卫·哈维提出的资本三级循环(three circuits of capital)^③被认为是解释城市空间如何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消费活动产物而被生产的经典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资本积累始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第一级循环),并在生产过剩或市场饱和时转向建成环境完善或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第二级循环),再随着经济复杂化和社会需求增强转向科技创新和社会福祉的方向(第三级循环)。虽然新马学者的解读易忽视日常生活差异与经验^[17],但上述模型所揭示的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循环规律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空间生产及演化提供了坚实基础。

1.2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开发区转型议题

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融合了行政权力嵌入、全球资本循环及其与城市和区域空间转型的互动过程;开发区作为政府权力与国内外资本的重要叠加地带,新马空间生产理论对其有较好的解释力^[3,18]。通过中央政

府的制度框架和地方政府的实施探索,开发区成为我国城市中普遍存在的空间实践现象;同时,作为引入外资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试点区域,开发区亦被视为全球资本空间修复的工具^[18-20]。总之,开发区的设立大大降低了制度创新、资本循环的交易成本,其空间生产实践也促进了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和城市空间转型。结合空间生产和资本循环相关理论,有助于解析开发区这一空间生产实践的转型规律。

同时也要注意,新马空间生产理论的产生背景与中国开发区的发展背景存在明显差异。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城市转型深受发展型政府等理念影响,在国家推进对外开放、创新驱动等国家战略时,开发区作为嵌入传统行政区体系的制度设计^[21],承担着政策试验、管理体制创新等使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进程中,开发区也成为探索国家企业资本主义的重要载体^[22-23],汇聚了国家和地方赋予的诸多政策和资源要素。因此,有必要在借鉴既有理论模型基础上,把握开发区作为我国制度空间的特殊性,系统辨析其空间生产特征、影响因素及演进模式,见图1。

2 开发区空间生产特征的分阶段解析

2.1 开发区的发展阶段概述

我国开发区分级、分类设置,已有诸多研究关注其发展与演化规律^[6,24-25];开发区40年来的实践历程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一是1980至1990年代末期,在国家正式宣布对外开放、聚焦经济建设后,开发区实践进入制度试验阶段。1984年我国在沿海开放城市设立了第一批经开区,随后在内陆省市广泛推广,在1990年代初甚至出现了“开发区热”现象^[26]。二是21世纪初期至2012年,是开发区制度历经较大改革的阶段。2001年我国加入了WTO,经济发展随即进入了快车道,但开发区的政策红利亦逐步消失;同时,开发区的无序拓展也导致了“开而不发”和土地资源浪费等问题,引发了中央政府的严厉整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家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开发区凭借其产业集聚和城镇拓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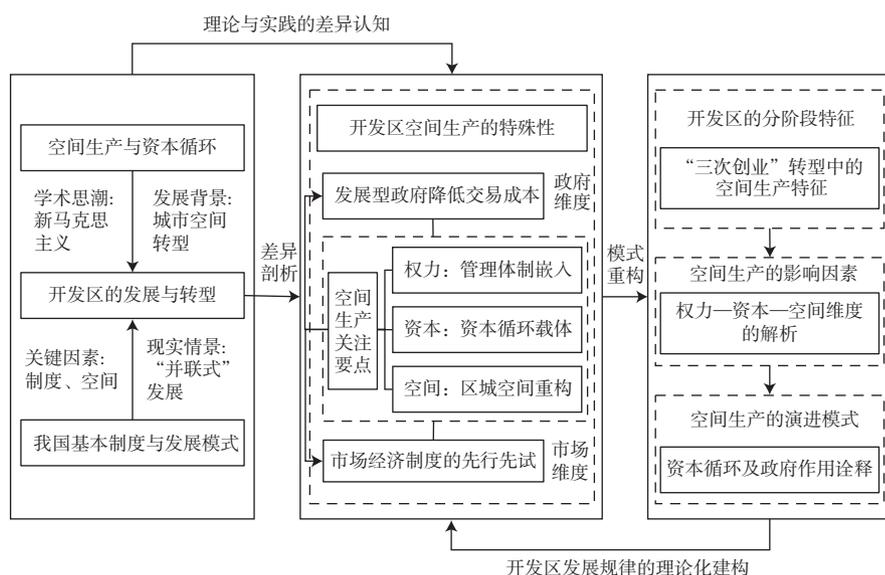


图1 研究分析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的功能再次受到青睐，全国范围内的布局规模显著增加。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发展理念，经济发展更为注重质量而非速度。在这一时期，中央政府更加重视开发区的全面均衡布局、转型创新和增强开放力度，意在促使开发区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链接载体，并以开发区为产业空间主体打造新兴战略区域^[27]，如国家级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2.2 开发区“三次创业”中的空间生产特征

开发区发展伴随多维度的转型^[28-29]，学界相关研究如高新区“二次创业”^[30-31]，以及开发区的“三次创业”^[7,32]等。审视开发区“三次创业”转型的宏观背景和发展模式，大致与前文所述的发展阶段相对应。第一次创业在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去中心化探索的背景下展开，所设立的开发区多为功能相对单一的工业园区，以招商引资为主要推进手段。第二次创业以新世纪初官方明确提出高新区“二次创业”^④口号为标志，各地开发区对产业升级和科技转化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第三次创业主要在2010年以后，开发区逐渐向综合性创新城区转变，诸多开发区蜕变为科技新

城或融入中心城区。此外，近年来已有学者^[8]结合对区域跨界合作等现象的考察，提出开发区“第四次创业”等概念。总体来看，开发区转型本质上是空间生产方式的变化，体现在各时期差异化的权力嵌入、资本循环及其影响下的空间重构过程。见图2。

第一次创业源于中央政府赋权于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开发区这类“工业飞地”来吸引外商投资，并通过成立管委会和出台“开发区条例”等措施规范其管理运作。开发区依托优惠政策、劳动力与土地成本优势等吸引国际资本和技术，进而参与到全球商品生产与消费循环之中。第二次创业时，开发区已崛起为所在城市的重要经济增长极，同时政府也在推动培育内生增长动力，相关政策侧重于打造创新载体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发区不仅积极引入科研院所和企业研发部门，还通过“扩区”整合城市中的重要科技和产业片区，以获取更多管理权限和资源从而推动再生产。第三次创业正值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央政府日益重视开发区在区域重大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并开始推动开发区与所在行政区的尺度重组和融合发展，许多城市的开发区已从单一的工业生产载体转变为以产城融合方式推动城市空间创新发展的关键板

块^[33]。

3 我国开发区空间生产的影响因素

对比开发区“三次创业”实践与新马资本“三级循环”模型，可以发现，开发区第二、三阶段发展进程与该模型的第二、三级循环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图3）。其核心原因在于，“三级循环”模型源自对西方城市城镇化和工业化/后工业化过程的批判性思考；相比之下，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呈现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的特征，作为地区产业经济增长极和国家开放政策试验地，开发区的空间生产受到诸多中国特色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从空间生产理论较为关注的权力、资本、空间等维度出发，分析开发区空间生产中的空间实践主体、资本循环动机和区域互动模式等三类关键因素。

3.1 空间实践主体

国家行政权力的深度嵌入是我国开发区实践的重要特征，决定了其空间生产过程主要由政府主导并推动。在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建设用地指标自上而下分配等制度下，我国各级政府掌握着城镇空间的规划权和建设项目审批权，并通过市场化的机制设计，主导开发区建设和发展^[34]。尤其在开发区实践初期，地方政府及国有开发公司深入参与其空间生产，既为土地一级市场的供给与开发主体，又是二级市场的规则制定者和重要投资者。

在行政管理方面，开发区受中央和省级政府主管部门监管，其管委会通常会被授予超出常规的经济管理权限，并可“托管”周边政区。然而，这类管理体制具有试验性质，其包容性和灵活性在释放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时，也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因而有必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提高法治水平。在市场参与方面，开发区成为各类市场主体集中布局的产业经济空间，并逐渐融合民众与组织形成丰富的社会结构。总体来看，开发区兼具政府职能和市场运作的双重特征和优势，大部分开发区采用“管委会+开发公司”模式，既发挥了管委会精简高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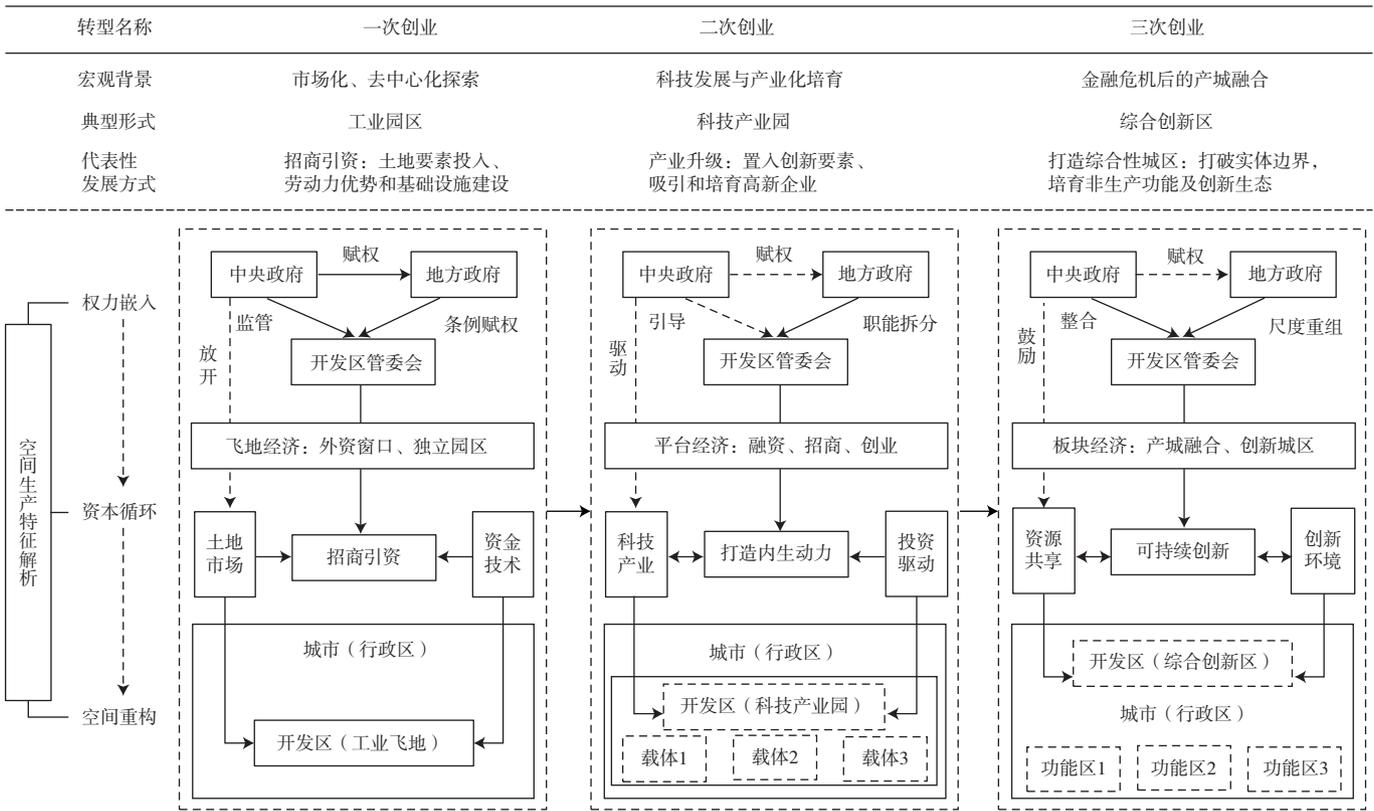


图2 开发区“三次创业”转型中的空间生产特征

Fig.2 The spatial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three transitions of development zones

的特点，也利用了开发公司市场化配置资源的能力，见图4。在这一体制下，开发区呈现出项目审批和建设速度快、效率高的优势，但也容易导致管委会权责范围过大，或盲目追求产业经济发展而忽视公共事务等弊端。

3.2 资本循环动机

不同主体参与开发区建设的利益诉求各异，协调多方利益关系并促进资本高效循环，是开发区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中央政府战略指导下，地方政府及其派出机构承担管理职责，使开发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多元利益主体实现战略目标和经济利益的博弈平台，并在不同空间生产阶段呈现出差异化的目标取向与发展模式。

中央政府为推进改革和促进发展而在开发区进行政策试验，希冀实现制度创新和重塑区域发展版图，并产生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地方政府则更关注通过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提升经济绩效与政绩表现，因此往往在土地供给、基础设施建设、财税优惠等方面采取倾斜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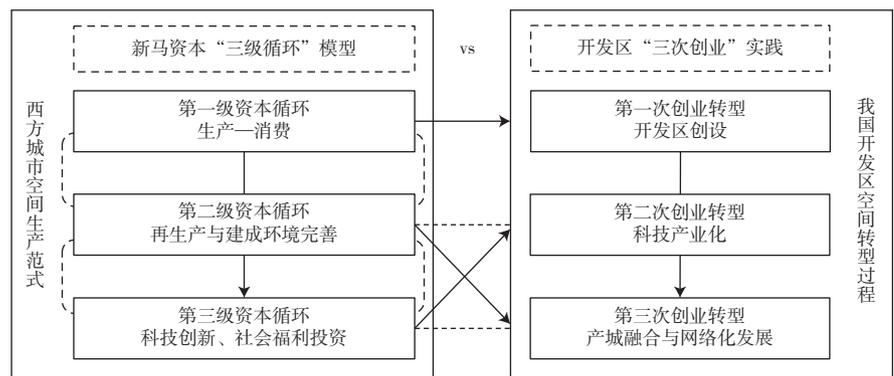


图3 开发区实践与理论模型间的发展阶段差异示意

Fig.3 Differences between practic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zones and the three circuits of capital model

策，以吸引投资。在资本层面，早期的国际资本以及日益壮大的国内资本往往被开发区优越的投资环境所吸引，以实现市场拓展和利润增长为目标。这种多元资本循环动机促使开发区的发展实践不断调整，以兼顾国家战略任务的落实和多方利益主体的需求，从而形成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的动态发展机制。见图5。

3.3 区域互动模式

开发区与所在城市的互动模式塑造了不同的区域空间格局。作为城市的产业集聚区，开发区不仅是城市实现空间拓展和工业投资的承载地，还与城市其他空间单元形成了紧密的功能联系^[35]，深刻影响开发区的空间生产演化。早期开发区多布局于中心城区边缘，随着城市扩张和开发区自身的发展演化，逐步形成了以下3种典型的区域空间互动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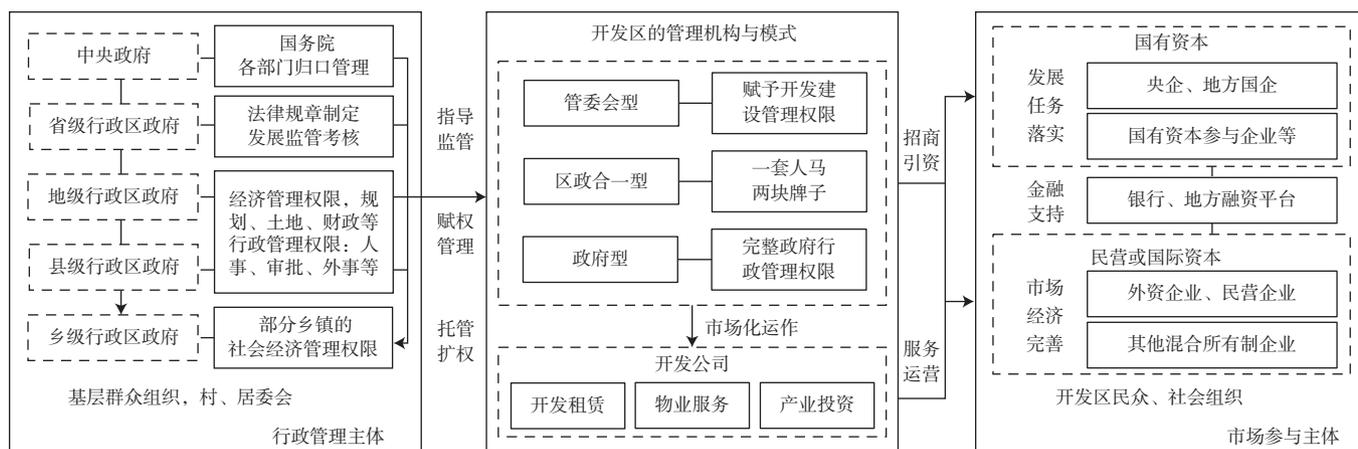


图4 开发区空间实践主体关系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actors of spatial production in development zo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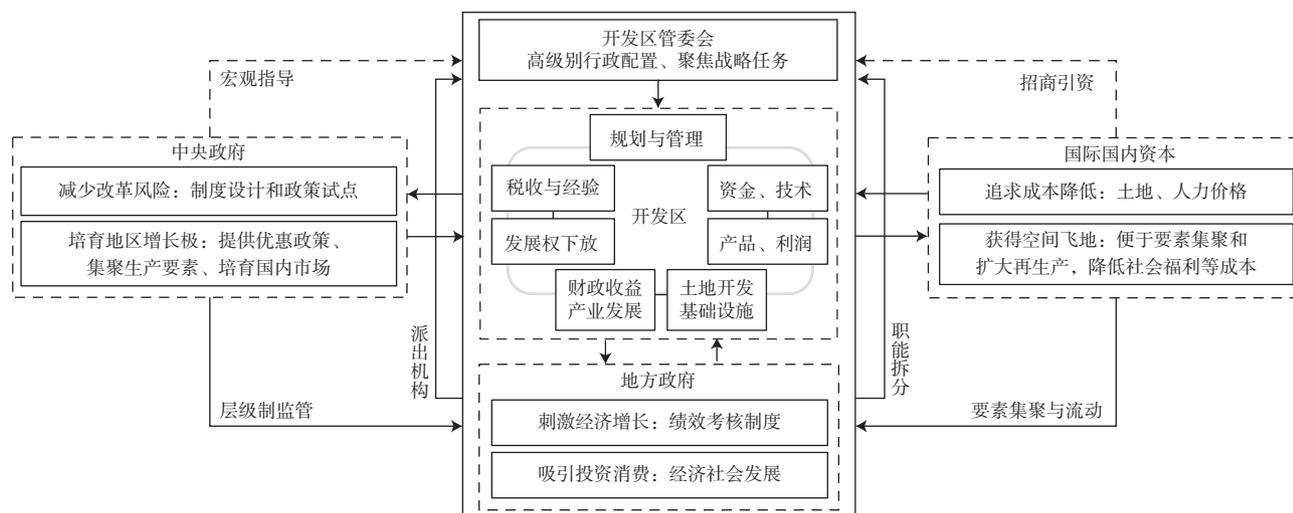


图5 开发区资本循环动机示意
Fig.5 The capital circulation motivation of spatial production in development zones

式，见图6。

一是“区政合一”模式，即开发区的扩展主要在属地政区范围内进行，逐步与所在行政区深度融合。此模式下，许多国家级开发区的管理委员会与区级政府合署办公，实现行政管理一体化。例如，广州开发区、苏州高新区、常州高新区均采用该模式，以强化行政协调与资源统筹能力。二是“跨区管辖”模式，即通过托管多个行政区，实现跨区县或跨街镇的统一管理。例如：苏州工业园区作为国际合作打造的现代化新区，其管委会直接接管吴中区和虎丘区的五个街道；北京亦庄新城则由北京经开区

发展而来，跨越大兴与通州两个行政区，形成跨区治理格局。三是“一区多园”模式，即部分大城市的开发区通过共享产业政策、人才资源等，促进全市产业协同发展，将空间上不连续的产业园区、创新基地整合至开发区体系之中。例如，上海张江、北京中关村在既有园区基础上建设“科学城”，并逐步整合市域范围内的高科技产业片区，以增强整体创新能力。此外，近年来各地实践中还出现了多种类型开发区平台的“多区合一”，以及在不同地区共建“产业飞地”的多尺度空间重构现象。上述开发区与城市的互动模式，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

不断的试错和优化调整中发展演化，以适应新的产业需求和城市发展格局。

4 我国开发区空间生产的演进模式

基于对权力、资本、空间等多维影响因素的分析，对我国开发区各阶段空间实践的转型机理及政府的关键作用进行阐释，并对资本三级循环模型进行适应性调整，以归纳开发区空间生产的演进模式。

4.1 第一阶段：创设产业飞地，融入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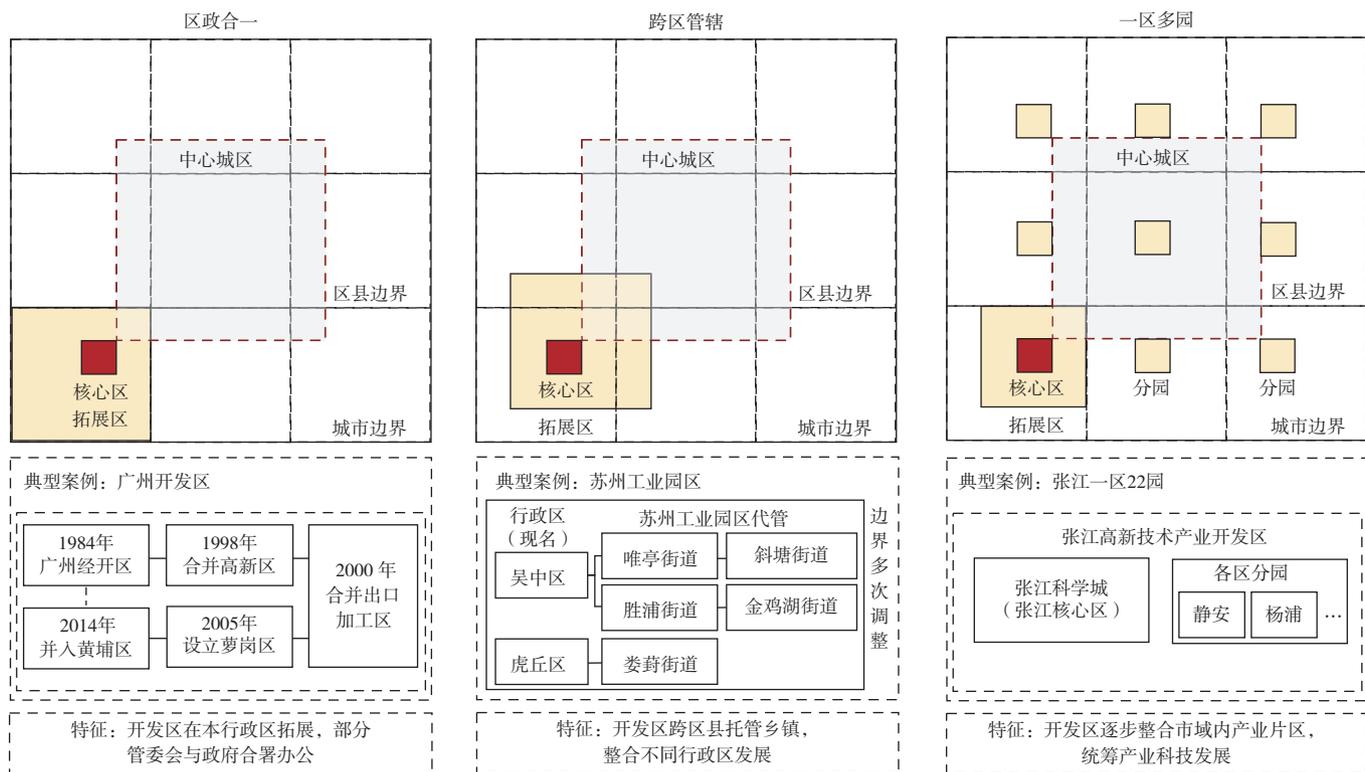


图6 开发区与城市的典型空间互动模式分析

Fig.6 Analysis of typical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s between development zones and cities

济外循环

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赋权各地探索开发区建设，以引入外资并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在生产环节，开发区作为“三来一补”等贸易模式下的生产基地，嵌入全球产业链并作为“飞地”参与经济外循环。尽管早期开发区以中低端加工制造业为主，但其技术在引进、市场开拓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效。在消费环节，开发区主要面向国际市场，但其发展亦促进了国内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

本阶段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创设方面，包括从沿海到内陆梯度推进开放、设立各类开发区，以及颁布“外资三法”^⑤等法律。同时，国家改革经济管理与社会管理体制，放宽人口流动限制，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发展。这些举措有效降低了开发区空间生产的交易成本，吸引国际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助力经济增长与社会福祉提升。例如至1980年代末，已设立开发区利用银行贷款与自筹资金，共成片开发约25 km²工业区，并累计批准外资项目766

个，合同外资金额达13.6亿美元^⑥。值得注意的是，开发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国内消费市场培育则无法在短时期内形成，使得开发区与周边城市空间存在显著制度落差，边界内外的建设面貌出现较大差异。

4.2 第二阶段：生产环节优先，消费环节滞后

开发区产业经济实现初步积累后，管委会等管理主体更关注提升工业产出与财税收益，导致生产环节优先发展的趋势。一方面，通过不断做大规模经济，包括拓展园区边界、完善基础设施并参与城际产业竞争，以开发区作为政策工具促进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开始注重开发区的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以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本阶段不同层级政府的关注点各有侧重。中央政府重点规范开发区的发展模式，包括确立“招拍挂”制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⑦，出台法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地方政府则在探索市场化开发模式如设立城投公司等，但仍依赖于规模

扩张为主的土地金融模式，存在非市场化方式出让工业用地的现象^[36]。此外，开发区凭借其产业高地定位和较高的行政级别，在重大城市项目及新增建设用地的分配等方面享有政策倾斜，例如，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广州开发区等3个国家级开发区已经成为重大战略项目、科学装置等的集中承载地，其空间边界内建设用地占比分别从2000年的49%、33%、19%，已经提升至2020年的73%、69%、41%^⑧。简言之，该阶段在政府、市场等多方推动下，开发区的生产环节不断完善；但消费环节受制于民众消费能力不足、政策与人口红利减弱，生产与消费的不均衡进一步加剧。

4.3 第三阶段：推动产城融合，完善国内大循环

进入存量发展时代后，开发区实践进入新阶段。一方面，开发区与城市建成空间的叠合，使产城融合成为转型发展的关键，尤其是各大城市的成熟开发区已逐步成为城市副中心。另一方面，随着产业升级与企业外迁，传统开发区

内的产业园成为城市更新和创新转型的主要载体。因此，亟须优化开发区消费环节，以支撑“双循环”新格局，并推动发展成果最大限度惠及人民。

本阶段政府既关注解决开发区的实际问题，又将其视为治理创新的关键抓手。从问题导向看，面对全球经济外循环的不确定性，政府认识到打通和完善经济内循环的重要性，要求开发区承担协调区域发展、推进制度创新等功能。因此，针对开发区产业单一、管理体制不畅等问题，政府推动其向城市综合功能区转型。从目标导向看，政府致力于通过产城融合，构建多元化区域创新体系，使开发区成为创新城区的核心载体，带动城市可持续发展。例如，截至2022年，国家级经开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约12%，但外资使用比重从2013年超过56%的峰值下降至约23%。同时，全国东西部合作共建的经开区、对口援疆援藏援助边（跨）境合作区等数量已经超过500个^①，成为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总之，开发区已成为促进城市消费的重要工具^[37]，并逐步发展为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的空间载体，承担着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推动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职能。

4.4 开发区的空间生产演进模式总结

总体来看，政府在不同时期对于开发区生产与消费环节的重视程度与推动力度存在差异，导致开发区的空间生产呈现出“分阶段、分环节”的演进模式，既体现了政府主导、市场参与下资本多级循环的特征，也反映了不同阶段中生产与消费环节推进速度的不均衡（图7）。其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各阶段承担制度设计与优化的核心职能，并在实践过程中分别扮演着参与者、管理者和服务商的角色。同时，国内外市场主体、城市居民及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也在不断完善的开发区制度框架下深度参与其发展与转型。

政府在开发区空间生产的各阶段，不断调整其职能作用。在开发区创设阶段，各级政府通过空间开发和规划建设方面的制度创新，如建设用地折价入股、土地出让方式改革等，为开发区空间生产的有序推进奠定了基础。在产业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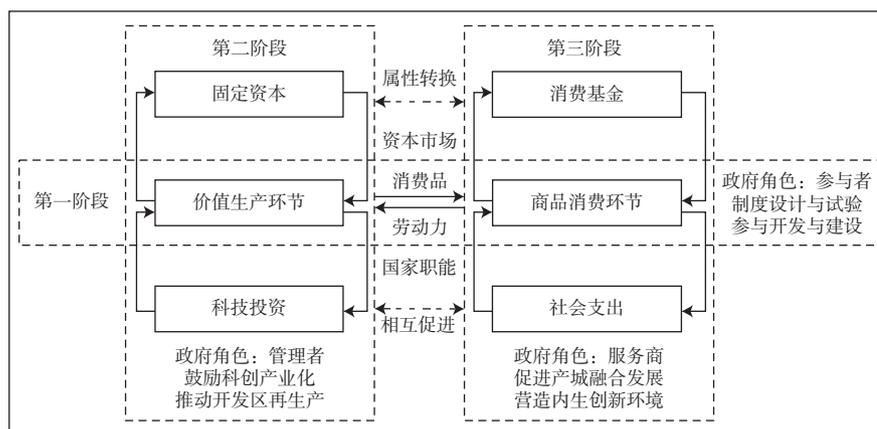


图7 开发区空间生产的“分阶段、分环节”演进模式

Fig.7 The multi-stage and multi-process evolutionary pattern of spatial production in development zones
资料来源：基于哈维资本三级循环模型改绘

主导阶段，管委会往往侧重于满足企业的生产与扩张需求，推动科技创新的产业化应用。在消费空间完善阶段，管委会及地方政府则通过针对产业空间的城市更新、公共服务设施的优化配置等手段促进产城融合，并积极优化创新生态，与市场主体共同推动消费空间的发展与完善。

5 结语

我国开发区在40年的实践中存在多阶段的空间生产进程。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开发区空间生产特征与传统理论模型的差异，深入辨析空间实践主体、资本循环动机，以及区域互动模式等影响因素，总结形成适用于阐释我国开发区空间生产的分阶段、分环节演进模式。

研究发现，我国开发区的空间生产经历了3个阶段的演进：第一阶段，通过引入外资使得开发区融入全球产业分工；第二阶段，依靠财税优惠和生产空间建设推动生产环节的优先升级，但消费空间的打造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第三阶段，聚焦产城融合、创新驱动与区域协调，逐步引导国内外资本促进消费环节的完善。与西方城市的空间资本化过程相比，我国开发区的空间生产模式展现了政府在制度设计与空间实践中的核心作用。在空间实践主体、资本循环动机、区域互动模式等3个方面特色因素的影响下，各级政府推动了开发区的权力嵌入、资本循环和空间重构，通过对

市场机制的适应性调整，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生产模式。

今后一段时期，开发区将继续在我国“双循环”格局、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桥梁和载体作用，而深化对其空间生产过程的认知，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城市理论。本研究归纳形成“分阶段、分环节”的开发区空间生产演进模式，有助于剖析我国政府驱动下开发区和城市空间的发展规律。但是，研究主要归纳了开发区总体的空间生产模式，其探讨对象主要是经开区、高新区等综合性国家级开发区，并不能穷举所有的开发区类型与模式。未来研究可扩展分析不同类型开发区的空间生产模式，以进一步丰富相关理论内涵。

感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赵民教授对文章初稿的指点，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感谢编辑老师在文章发表过程中的帮助。

注释

- ① 参考中国政府网“习近平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网址为：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0/content_6981715.htm。
- ② 三者分别指：①既包括物理空间，如城市环境、建筑等；也包括塑造空间的过程，例如空间的使用和的日常活动。②空间通过符合表征来感知，例如图像（地图）、语言等。③空间中嵌入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关系，例如意识形态、制度结构等对其的

影响和反馈。

- ③ “资本三级循环(回路)模型”是哈维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与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的总结。哈维对此类通过地理空间扩张和重构以解决资本过度累积危机的方式予以强调,可称为“空间修复”。
- ④ 2001年9月在武汉举行的国家高新区所在城市市长座谈会,提出了高新区的“二次创业”口号。
- ⑤ “外资三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 ⑥ 相关数据参考《中国经济特区与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年鉴》(1980—1989年鉴)。
- ⑦ 相关政策参见《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等。
- ⑧ 研究以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和广州开发区为案例,根据各开发区2020年涵盖片区,在GPS平台基于Landsat的30m分辨率土地覆盖数据集,进行处理和计算。
- ⑨ 相关数据统计自历年《中国开发区年鉴》,以及各年度“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结果”等。

参考文献

- [1] 赵民,王启轩.我国“开发区”的缘起、演进及新时代的治理策略探讨[J].城市规划学刊,2021(6):28-36.
- [2] 甄杰,任浩,唐开翼.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历程、形态与逻辑[J].城市规划学刊,2022,(1):66-73.
- [3] 李凯,王凯.新马克思主义视野下中国开发区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J].国际城市规划,2019,34(5):50-58.
- [4] 丁成呈,张敏,姜莘,等.重构与扩张:转型期开发区空间生产研究[J].城市规划,2019,43(7):67-74.
- [5] 杨凌凡,罗小龙,唐蜜,等.城际合作园区转型的制度空间重构机制:以锡沂高新区为例[J].地理科学,2022,42(7):1196-1206.
- [6] 张茜,王兴平.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开发区政策演变特征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19(2):61-67.
- [7] 罗小龙,郑焕友,殷洁.开发区的“第三次创业”:从工业园走向新城:以苏州工业园转型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1,20(7):819-824.
- [8] 李鲁奇,孔翔.“第四次创业”中开发区跨界联系的网络特征与微观机制[J].地理研究,2022,41(10):2648-2662.
- [9] LEFEBVRE H, NICHOLSON-SMITH 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lackwell, 1991.
- [10] HARVEY D. The urban process under capitalis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78, 2(1-3): 101-131.
- [11] 庄良,叶超,马卫,等.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新区的空间生产及其演化逻辑[J].地理学报,2019,74(8):1548-1562.
- [12] 曹姝君,罗小龙,王春程.开发区空间演进的制度解释[J].城市问题,2018(5):79-84.
- [13] 何鹤鸣.增长的局限与城市化转型:空间生产视角下社会转型、资本与城市化的交织逻辑[J].城市规划,2012,36(11):91-96.
- [14] 刘云亚,韩文超,闫永涛,等.资本、权力与空间的生产:珠三角战略地区发展路径及展望[J].城市规划学刊,2016(5):46-53.
- [15] 殷洁,罗小龙,肖菲.国家级新区的空间生产与治理尺度建构[J].人文地理,2018,33(3):89-96.
- [16] 叶超,柴彦威,张小林.“空间的生产”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启示[J].经济地理,2011,31(3):409-413.
- [17] 杨舫,陈弘正.“空间生产”话语在英美与中国的传播历程及其在中国城市规划与地理学领域的误读[J].国际城市规划,2021,36(3):23-32.
- [18] 陈嘉平.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中国新城空间演变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13(4):18-26.
- [19] WANG J. The economic impac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municipalitie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3, 101: 133-147.
- [20] MA T, CAO X, ZHAO H. Development zone policy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quasi-natural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hina[J]. Regional Studies, 2023, 57(3): 590-605.
- [21] 王启轩,赵民.国家级开发区的尺度演化与元治理思考:以上海张江高新区为例[J].城市规划,2023,47(5):4-14.
- [22] WU F. Planning centrality, market instruments: governing Chinese urban transformation under state entrepreneurialism[J]. Urban Studies, 2018, 55(7): 1383-1399.
- [23] ZOU Y. Capital switching, spatial fix, and the paradigm shifts of China's urbanization[J]. Urban Geography, 2022, 43(10): 1662-1682.
- [24] 张艳.国家经开区与高新区的政策渊源探究及反思[J].城市规划学刊,2011(3):51-57.
- [25] 刘合林,聂晶鑫.2006—2018年中国省级以上开发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变化[J].自然资源学报,2020,35(9):2229-2240.
- [26] WEI Y D. Zone fever, project fever: development policy,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urban expansion in China[J]. Geographical Review, 2015, 105(2): 156-177.
- [27] 王兴平,韩静.国家级新区内“多区叠合”现象及其效应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22,29(6):43-52.
- [28] 曹贤忠,曾刚.国内外城市开发区转型升级研究进展与展望[J].世界地理研究,2014,23(3):83-91.
- [29] 袁奇峰,李刚,薛燕府.产业集群视角下广州开发区的科创转型与空间响应[J].城市规划学刊,2022(4):95-102.
- [30] 周元,王维才.我国高新区阶段发展的理论框架:兼论高新区“二次创业”的能力评价[J].经济地理,2003,23(4):451-456.
- [31] 辜胜阻,郑凌云.新型工业化与高技术开发区的二次创业[J].中国软科学,2005(1):15-22.
- [32] 王胜光,朱常海.中国国家高新区的30年建设与新时代发展:纪念国家高新区建设30周年[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33(7):693-706.
- [33] 许闻博,孙昊,李福映,等.城市开发区群的制度空间演化和“板块效应”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23,30(11):100-108.
- [34] WU F, PHELPS N A. (Post) Suburban development and state entrepreneurialism in Beijing's outer suburb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11, 43(2): 410-430.
- [35] 陈家祥,王兴平.南京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扩散研究[J].城市规划,2007(7):32-38.
- [36] XI Q, MEI L. How did development zones affect China's land transfers? the scale, marketization,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effect[J]. Land Use Policy, 2022, 119: 106181.
- [37] WEIZENG S, JIANFENG W, SIQI Z. The consumption-driven effect of place-based industrial polic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development zone policy[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20, 41(4): 44-62.

修回: 2025-03